

故宫问学

章宏伟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故宫问学

章宏伟 著



紫禁城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宫问学/章宏伟著.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9
ISBN 978-7-80047-539-9

I. 故… II. 章… III. 故宫-文集 IV. G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3000 号

故宫问学

作 者: 章宏伟

责任编辑: 陈晓东

封面设计: 李 猛

出版发行: 紫禁城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 4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16 010-85007818 传真: 010-65129479

邮箱: ggzjc@vip.sohu.com

印 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4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047-539-9

定 价: 36.00 元

序 言

宏伟同志将关于故宫的一些论文结集为《故宫问学》，问序于我，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我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以来，每看到一本故宫员工的著作问世，都倍感欣慰。特别是关于故宫学术的论著，我更加关注。

自2003年提出“故宫学”以来，我一直孜孜于故宫价值发掘与故宫学的探索，从不同方面述说故宫、研究故宫、认识故宫。故宫是个学术宝库，故宫文化的核心是以皇帝、皇权、皇宫为中心的皇家文化，是多门知识和学问的集合，紫禁城宫殿建筑群、文物典藏、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及故宫博物院的历史等六个方面，构成了故宫学研究的学科基本内涵。对于一个做学问的人来说，故宫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大宝藏、大宝库，只要你有心，你付出，就不会空手而归。同时，故宫也需要很多不同学科、不同专长的学者来共同研究。

故宫博物院有学术研究的传统。1925年10月10日，在进行文物清点及其他筹备工作的基础上成立的故宫博物院，既是故宫古建筑群与宫廷史迹的保护管理机构，也是以明清皇室旧藏文物为重点的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品的收藏、研究和展示机构。当时参与清宫物品点查与故宫博物院建设的骨干力量主要来自北京大学，而北京大学是当时全社会在文化思想与新学科研究方面的先导。北京大学的研究所国学

门，“于古代研究，则提倡考古学，注意古器物之采集；于近代研究，则重公家档案及民间风俗”。胡适谈到当时的整理国故运动时说：“‘国故’是‘过去的’文物，是历史，是文化史；‘整理’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那以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去组织局部的或全部的中国文化史。……北大研究所的态度可以代表这副精神”。这种精神与态度也深深影响着新成立的故宫博物院。皇宫变成博物院，不只是重大的历史变革，还具有用新文化的思想审视、研究传统文化的意义。

这些年我在探讨故宫学时，一直在思考“故宫学派”的问题。应该说，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起，就重视学术研究，那时依托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逐渐形成了重实证、不空发议论、文献与实物并重的实事求是学风，涌现了如陈垣、马衡等一大批治学严谨的学者。20世纪50年代后，故宫博物院成为全国学术研究的重地，拥有一大批专家学者，产生过众多研究成果。它在中国博物馆学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明清历史和宫廷文化研究、文物保护与鉴定等领域占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故宫的专家学者群彦争辉，唐兰、罗福颐、沈士远、孙瀛洲、陈万里、冯先铭、单士元、刘九庵、朱家溍、于倬云、徐邦达、耿宝昌先生等，在学界卓有威望。虽然专业各异，研究的领域和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同，但他们都强调走实证治学之路，以文献与文物结合的研究路数为重要标志，不作无根之谈。他们之后，薪火不息，代代相传，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其他研究机构的比较有特色的治学方法，这大概就是学术史上常说的“学派”了，我且称之为“故宫学派”。在故宫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故宫学派”的存在是其重要条件之一；而故宫学研究的不断推进，已经团结和吸引了一大批故宫内外的专家学者，这些人由于在研究方法、学术思想、风格思路等方面较为相近，有条件形成一个以融通历史与文博、沟通文物与文献的研究理念和特色的学术群体，促进以故宫学者为主体的“故宫学派”的发展壮大。不是说故宫人治学必是“故

宫学派”，也不是说故宫以外的学者不会采用“故宫学派”的治学路数，而是说，只要是治中国传统文化之学，采取文献与文物相结合，重实证不空谈，学风严谨，求真求是的治学路径的，都是“故宫学派”采用的治学路子。当然，如果采取这样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研究的又是关于故宫的学问的话，那应该是不折不扣的“故宫学派”。

故宫博物院一些有较好专业基础的比较年轻的研究人员，在故宫的治学氛围里，耳濡目染，浸淫于求实求真的学术氛围中，使他们逐渐走上与前辈相契合的治学路径，逐渐成为“故宫学派”一份子。宏伟同志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份子。

宏伟同志有治学的基本素养，学术功底扎实，不轻信，不盲从，对问题勤于思考，敏于求证。他坚持从第一手材料出发，做考据文章，依据档案文献实物重做考量。他继承了故宫老一辈学者严谨的治学方法，“不以空论为学问……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他重第一手材料，在《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序》中反复申言第一手材料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并作为自己研究实践的理论基点。清人顾炎武极力反对西汉以来那种主观臆断的学术方法，非常关注学术研究的材料基础，主张目验，倡导实测，重视第一手材料，而把利用第二手资料比作买铜铸钱：“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宏伟同志在研究历史时总是力求使用第一手资料，并注重文物（实物）与文献资料的结合，因而经常能够得出新的结论。《全唐诗》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部唐诗总集，又是清代“康版”的代表之作，历来有多少治唐诗、唐代文学、版本学、刻书史、目录学、图书馆学的学者，接触、使用、研究这部书，但宏伟同志提出“在刊刻《全唐诗》之前并没有扬州诗局的存在”，指出学界长期沿袭的

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宏伟同志这样的学术研究是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他追求这样的学术境界，学术就不是无根的，凭资料阐发虽然可能有些琐细，但都是实学。

宏伟同志在《嘉兴藏》研究上所下功夫较深。如《嘉兴藏》在五台山时期的刻藏地点的考证，故宫老专家杨玉良已经依据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得出五台山时期有妙德庵和妙喜庵两个刻藏地点的结论。宏伟发现自己整理的材料与杨先生不同，遂开始艰苦的求证，重新翻查《嘉兴藏》四遍，得出只有妙德庵一个刻藏地点的结论，并找出杨先生致误的原因，有理有据，对于一部有12 000多卷的浩繁卷帙来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是可以想见的。他关于满文《大藏经》的研究，从书名、修书机构、翻译刊刻时间诸多方面提出了新的观点。台北故宫博物院庄吉发先生是最早研究满文《大藏经》并且取得了相当成就的专家，在看了宏伟同志的研究后，在其论文上批道：“论文详尽，深具学术价值。拙著《清史论集（三）》页28，已提及《清文全藏经》及《清文翻译全藏经》字样。大作中所论各点，弟俱同意。”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曹之教授也写信称赞宏伟的论文《毛晋刻书活动考论》“深究毛晋刻书始末，功非浅鲜，堪称毛晋研究的第一篇宏文”。我不是做这些专题研究的，对于研究的学术背景、深度不了解，但相关研究者、特别是同行的评价，可以看出宏伟研究的深度。

宏伟同志的研究注重学术规范，学风比较正。从他的参考文献、注释中可以充分看到他这方面的修为。他尊重学术，坚持学术面前人人平等，面对尊敬长者的不同见解，坚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原则，不虚美，不为讳；对青年学子的研究，只要可取，概不抹杀，随处征引随处标举；对于前人已有的成绩，总是尽量揭示、表彰，这与那些利用别人成果而不标注出处的人相比，相差何止千里。他总带着感恩之心，对于曾经帮助过他的同志，如在审稿中指出不足，哪怕只是代为复印一本资料，也都诚心诚意地表示感谢。

宏伟同志重视文物与文献的结合，能充分利用故宫现有的文献资料，对文物进行研究。结合故宫所藏文物，重视有关资料的整理。他做得最多的是有关图书文献的研究。宏伟同志知识领域宽广，善于开拓，从他写的《祥云轩红山玉龙鉴藏与真伪辨析·序》、《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序》等来看，已见触类旁通的功效，玉器鉴定、陶瓷史都不是他研究的方向，但他写出了让专家称道的文章。

宏伟同志对学术研究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和感觉，有激情，有毅力，十几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坚持不懈，勤奋刻苦，求真求实，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成绩。近年来，他不仅科研成果数量在故宫名列前茅，有些成果也是故宫研究水平的一个反映。他和故宫的其他专家一起，在不断发掘故宫的丰富内涵，为发展故宫学添砖加瓦。宏伟同志在做一点一滴的积累工作，这是一个学者的本分。我对宏伟同志在学术上的探索寄予厚望，期待他取得更大的成绩。

推进故宫学研究，是故宫博物院在 21 世纪的学术使命、学术责任。在故宫学研究中，要继承并弘扬故宫学术研究公开、开放的传统。故宫博物院正在将文物清点的成果向社会公布，《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已经开始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也即将问世，故宫还办有《故宫博物院院刊》、《紫禁城》、《故宫学刊》等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多种刊物，目前又在编纂《故宫百科全书》。故宫的学术研究在不断推进，期望有更多的人士关注并投入故宫学研究，期望故宫学研究有新的发展，取得更大的成绩。

郑欣淼

2009 年 8 月 27 日

目 录

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的价值

——从《嘉兴藏》学术研究史角度来探讨	(1)
清代前期的满文教育与满文出版	(92)
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研究	(129)
《清文翻译全藏经》书名、修书机构、翻译刻印时间考	(166)
《四库全书》与文渊阁	(204)
《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序	(212)
《祥云轩红山玉龙鉴藏与真伪辨析》序	(231)
《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序	(257)
明代观政进士制度	(290)
明代工部尚书雷礼生平考略	(309)
袁了凡生卒年考	(366)

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的价值

——从《嘉兴藏》学术研究史角度来探讨

《嘉兴藏》是我国明末清初民间出版^①的一大工程。它谋刻于万历初年，初刻于山西五台山，后移至杭州径山寂照庵等处继续雕刻，直到清代嘉庆年间才终止刊刻，历时 200 余年。^② 因其在浙江嘉兴楞严寺流通发行而称为《嘉兴藏》或《楞严寺藏》，以其雕版存贮于浙江径山寂照庵亦名《径山藏》，由于它的版式呈书本册装又称《方册藏》，以正藏的刊刻年代作《万历藏》，依主其事者称《密藏本》，又该藏传至日本，被日人称作《支那藏》或《明藏》。该藏别名之多，

① 自从叶德辉《书林清话》提出我国古代刻书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三个系统以来，这个观点长期为研究版本目录学、书史、印刷史、编辑出版史的学者所遵循。笔者提出应该根据出版的投资主体和经营性质来划分，大体可分为政府出版、私人出版和民间出版三大系统。政府出版是指政府各级机关所从事的出版，通常称为官刻；私人出版是指私家个人出资校刻图书，包括私宅、家塾和书棚、书坊、书肆、书籍铺等，通常称为家刻或坊刻。书坊是古代卖书兼刻书的店铺，是一种具有商业性质的私人出版发行单位。以往版本学上刻意与坊刻分列的“私刻”，除了标有“某家塾”、“某宅”等字样外，与坊刻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民间出版介于官刻和私刻之间，它们从事出版的投资有的既非公帑，亦非个人私家之钱，而是靠民间集体的力量集资而来，如某些寺院、道观、祠堂等，用募捐或家族积累刻书，书院刻书也应该归于这个系统。这样分类比较符合中国古代出版业的实际。详参笔者《两宋出版业考述》，《出版文化史论》，华文出版社，2002 年 1 月。

② 请参阅笔者《〈嘉兴藏〉与〈铁眼藏〉》，江南与中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复旦大学，2008 年 9 月；《〈嘉兴藏〉对于出版史研究的意义》，《嘉兴藏》重辑出版学术高层论坛，浙江嘉兴，2008 年 11 月。

实为诸藏之冠。目前学界一般称作《嘉兴藏》。

因为《嘉兴藏》在近世没能普及，学术界知道《嘉兴藏》而且能应用的人，为数实在不多。就连仅有的几篇《嘉兴藏》研究文献，对《嘉兴藏》的刊刻时间、收书种数、卷数、主持人等最基本的叙述都是分歧互见，存在种种不同说法。历来论述《嘉兴藏》者无虑数十，且真正能算做《嘉兴藏》研究的并不多，主要有以下几家：

1. 陈豪楚：《径山寺刻藏述》^①，主要从馆藏八种《嘉兴藏》零本的施刻愿文出发，学术路径的选择非常对。

2. 吕澂《明刻径山方册本藏经》^②，由于作者研究的重心始终没有离开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因而本篇虽然文字不多，但多有融会之语。

3. 李孝友《浅谈明代刊刻的〈径山藏〉》^③，是作者在编辑《全国古籍善本书目》过程中，对云南省图书馆庋藏的《嘉兴藏》做过整理后发表的论文，是新时期关于《嘉兴藏》的第一篇研究文献。文中对继庆和尚与陶氏弟兄参与《嘉兴藏》校勘刻印工作的叙述，影响了以后学者考察《嘉兴藏》刊刻源流的视线。

4. 蔡运辰编著《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④，是“近代修藏大业及藏经目录中唯一的一部伟构”，该书荟萃各藏目录，综合排比，钩稽部数，校注异文，以《大正藏》为第一目录，不见于《大正藏》而见于各藏者为第二目录，每目下注明何藏何函，最下为备考，略注经名、译人、卷数的不同，或作其他必要的说明。是一部很

① 陈豪楚：《径山寺刻藏述》，张曼涛主编《大藏经研究汇编（下）》，第181-188页，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9月。

② 吕澂：《明刻径山方册本藏经》，《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三）》，第1484-1489页，齐鲁书社，1991年7月。

③ 李孝友：《浅谈明代刊刻的〈径山藏〉》，《文献》1980年第2辑（总第4辑）。

④ 蔡运辰编著：《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12月。

有用的工具书。

5.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曾对馆藏《嘉兴藏》做过一次整理，编印了《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目录》^①，并先后发表了《〈嘉兴藏〉整理记》^②和《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初探》^③两篇论文，这是在整理馆藏《嘉兴藏》的基础上所做的研究，是认真求实的、坐穿板凳的研究，因而无疑是值得提倡和关注的成果。但我们在整理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时，发现《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目录》与馆藏《嘉兴藏》并不完全相符，著录的如“续藏”第二十一函第十八种的《妙法莲华经玄义节要二卷》目有而实无^④，著录的施刻人也有错误（在有关毛晋的不多的几十部经书中就有错误^⑤）。故宫博物院文物保管制度严密，应该不会出现藏书被抽走情况，之所以出现有目无书这样的大差错，经询问《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目录》的编者之一杨玉良先生，她说当时编目时为了使《嘉兴藏》目录完备些，参考其他目录如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作了少许增录。由于没有作必要的说明，就使得《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目录》的价值大打折扣。

6. 金申根据中国佛教图书馆所藏《嘉兴藏》，对《嘉兴藏》刊刻初期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发表了《〈嘉兴藏〉在五台山的雕版

① 《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目录》，故宫博物院内部油印本。未署刻印年份。

② 杨玉良、邢顺岭：《〈嘉兴藏〉整理记》，《文献》第19辑，第200-216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2月。

③ 杨玉良：《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3期。

④ 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续藏第二十一函共六本：《妙法莲华经合论》一卷、《妙法莲华经合论》卷二之三、《妙法莲华经合论》卷四之五、《妙法莲华经合论》卷六之七、《法华经大意》卷上中下、《妙法莲华经意语》一卷。

⑤ 请参阅笔者《毛晋刻书活动考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第193-227页，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4月；《毛晋与〈嘉兴藏〉》，汉文大藏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师范大学，2007年9月。

情况》^①、《嘉兴藏的主刻僧密藏事辑》^②、《嘉兴藏初期的刻经活动》^③等三篇论文。

7. 蓝吉富先后发表《略论嘉兴大藏经的特色及其史料价值》^④、《〈嘉兴大藏经〉研究》^⑤两篇论文，从《嘉兴藏》拥有独家佛典数量之多出发，对《嘉兴藏》的编修过程、特性及史料价值做了探讨。

8. 童玮编《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⑥“主要是根据明刻《嘉兴藏》为底本参考编制的”，按经籍名称立目，有着与《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不同的功用。

9. 台湾“国家图书馆”编撰的《“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子部（四）·释家（汇编）》^⑦，实际上就是馆藏《嘉兴藏》书目解题，做的很到位，虽然偶有差失，但瑕不掩瑜，是一部很好的书目提要，也是迄今为止对《嘉兴藏》做的最为详备的工作。

10. 李富华《关于〈嘉兴藏〉的研究》^⑧，对《嘉兴藏》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刻藏始末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是我们重视的成果。

① 金申：《〈嘉兴藏〉在五台山的雕版情况》，《五台山研究》1987年第2期。

② 金申：《嘉兴藏的主刻僧密藏事辑》，《文史》第四十二辑，中华书局，1997年1月。

③ 金申：《嘉兴藏初期的刻经活动》，白化文编《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3月。

④ 蓝吉富：《略论嘉兴大藏经的特色及其史料价值》，《普门》1990年8月号，后收入《佛教的思想与文化——印顺导师八秩晋六寿庆论文集》第255-266页，题目改为《嘉兴大藏经的特色及其史料价值》。这篇文章笔者是在网上看到的，好在网上刊载的是图本，与印刷本无异。只是一时没有找到印刷本，不知出版单位与出版时间。待查。

⑤ 蓝吉富：《〈嘉兴大藏经〉研究》，台北《谛观》第70期（1992年7月）。台湾师范大学朱鸿教授复印该文惠赠笔者，深表感谢。

⑥ 童玮编：《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中华书局，1997年7月。

⑦ 台湾“国家图书馆”特藏组编：《“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子部（四）·释家（汇编）》，台湾“国家图书馆”，2000年5月。

⑧ 《关于〈嘉兴藏〉的研究》是李富华、何梅著《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的第十章，由李富华撰稿，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

11. 笔者因整理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的机缘，得窥该藏全貌，进而深入研究，现已发表《出版史研究中第一手资料的价值与意义——以〈嘉兴藏〉为例》^①，《明万历十七至二十年五台山方册藏刊刻考》^②、《方册藏的刊刻与明代官版大藏经》^③ 三篇论文。

虽然论者都说《嘉兴藏》重要，实际上只有为数极少的几篇研究文章，因而只能说研究刚刚开始。但论者又都在说《嘉兴藏》，只能是因袭旧说，因而各种说法不一而足，更有添油加醋，随意发挥，使得《嘉兴藏》情况更形扑朔迷离，离真相越来越远。汪家熔先生曾经对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④ 关于《嘉兴藏》的叙述加以批评^⑤，虽然没有也不可能从《嘉兴藏》本身出发，主要地只是依据陈豪楚《径山寺刻藏述》^⑥，但思路清晰，言之成理。

正因为对《嘉兴藏》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关于《嘉兴藏》的论述存在种种异说就不足为怪了。比如，关于《嘉兴藏》的刊刻时间，对于始刻年份，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有说是始刻于万历七年（1579年）^⑦ 的，有说始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⑧ 的，也有说

① 笔者：《出版史研究中第一手资料的价值与意义——以〈嘉兴藏〉为例》，中国编辑学会第六届编辑史出版史座谈会，北京，2004年5月。

② 笔者：《明万历十七至二十年五台山方册藏刊刻考》，第十届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南京，2004年8月。

③ 笔者：《方册藏的刊刻与明代官版大藏经》，《明清论丛》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8月。

④ 魏隐儒编著：《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5月。

⑤ 汪家熔：《关于嘉兴藏》，《出版史料》1992年第4期，收入《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10月。

⑥ 据汪家熔的引述，陈豪楚此文题《径山藏述略》，原刊《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四卷六期。从汪的叙述来看，《径山藏述略》应该就是收入张曼涛主编《大藏经研究汇编（下）》的《径山寺刻藏述》。因未核查《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不知两文是否有异，抑或谁给改题了。待查，本文以笔者所见列题。

⑦ 张秀民著：《中国印刷史》，第4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杨玉良：《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3期。

⑧ 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489页注〔三〕中说“日本人以为此版盖始于万历丙戌（1586年），终于顺治丁亥（1647年），凡阅61年而成”，但张先生没有指出这种说法的来源。

是始刻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对于终刻年份，说法就更多了，有说“正藏之完成，当在万历三十七年以前”^①，有说正藏在万历末年刻成^②的，也有说崇祯年间刻成正藏^③的；有说终于顺治四年（1647年）^④的，有说刻竣于康熙五年（1666年）^⑤、康熙六年（1667年）^⑥的，也有说完工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⑦、康熙十六年（1677年）^⑧

① 蔡念生：《三十一种藏经目录解说》“径山大藏经及续藏又续藏目录”，张曼涛主编《大藏经研究汇编（下）》，第268页，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9月。

② 周叔迦：《〈大藏经〉雕印源流纪略》，《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下集），第561页，中华书局，1991年1月。

③ 李孝友：《浅谈明代刊刻的〈径山藏〉》，《文献》1980年第2辑（总第4辑）。

④ 张秀民著：《中国印刷史》第489页注〔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

⑤ 周叔迦在《〈大藏经〉雕印源流纪略》中说：“后至清康熙五年又续集明清两代大德撰述如经疏、宗典、语录、史传、杂集等书，印雕成《续藏经》九十函二百三十七部，《又续藏经》四十三函一百八十九部。”可知周叔迦认定《嘉兴藏》正、续、又续三部分刻齐已是康熙五年。见《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下集）第561页，中华书局，1991年1月。

⑥ 《嘉兴典故辑要》（乾隆五十四年刊）：“楞严讲寺……后复敕刻大藏方册，于是臣庶协力，相继集事，至皇清康熙六年告竣。”

⑦ 道安：《中国大藏经雕印史》：“至万历十七年时，即在山西文殊菩萨化现之圣地——五台清凉山之妙德庵开板方册藏经。……至康熙十五年（西1676）二月，全藏1618部、7334卷之庞大方册大藏经，方始完成。”见张曼涛主编《大藏经研究汇编（上）》，第157-158页，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6月。赵国璋、潘树广主编：《文献学辞典》，第878页方广铝所撰“嘉兴藏”条，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方广铝著：《佛教典籍百问》第174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6月第2版；周少川：《汉文佛教典籍的产生及流传》，见氏著《中华典籍与传统文化》第7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童玮：《汉文大藏经简述》，见氏编《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第16页，中华书局，1997年7月。

⑧ 吕澂《明刻径山方册本藏经》说：“直到清代康熙六年（1667），正、续藏才基本完成。以后复补刻缺本，于康熙十五年（1676）完工。康熙十六年（1677）编刻《方册正续划一目录》。方册本大藏经从五台开雕以来，到此已历88年，才算全部完刻。”见氏著《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三）》，第1486页，齐鲁书社，1991年7月。叶恭绰《历代藏经考略》“历代刊刻大藏经主持机关人物及起讫年分表”则说：“明万历七年（1579）发愿，万历十七年（1589）始刊，清康熙十六年（1677）正藏完成。续藏、又续藏何时完成待考。”见张曼涛主编《大藏经研究汇编（上）》，第59页，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6月。李圆净《历代汉文大藏经概述》也说“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密藏幻余发愿，迄十七年（1589）始刊于五台……至清

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⑨、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⑩、康熙四十六年（1677 年）^⑪，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⑫，以至雍正元年（1723 年）^⑬的，等等。关于《嘉兴藏》全藏的函数、收书种数、卷数，也是众说纷纭，胡适说全藏（指正藏）693 函，续藏 90 函，又续藏 43 函；^⑭叶恭绰说《径山藏》“678 函，6 956 卷，1 654 部，函编

（接上页）康熙十六年（1677）正藏完成”，见张曼涛主编《大藏经研究汇编（上）》，第 98 页。释道安著：《中国大藏经雕刻史话》，第 143 页，台湾中华大典编印会，1978 年 10 月。李孝友《浅谈明代刊刻的〈径山藏〉》以为：《径山藏》在“崇祯年间刻成‘正藏’以后，历经清代顺治、康熙两帝增补，又有‘续藏’、‘又续藏’的刊刻，直到康熙十六年前后，《径山藏》才算全部刻成。”见《文献》1980 年第 2 辑（总第 4 辑）。张秀民著：《中国印刷史》，第 48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 9 月；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第 355 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 5 月；肖东发著：《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第 135-136、148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4 月。

⑨ 蔡念生在《三十一种藏经目录解说》“径山大藏经及续藏又续藏目录”中说：“正藏之完成，当在万历三十七年以前，距始刻为 20 年。续藏完成年月无考，按之各本题记，最后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中华丛书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所载目录，包括未入藏部分。其不见于径目者，有雍正年所刻，盖于全部刻成后又有增辑，即所谓未入藏也。”见张曼涛主编《大藏经研究汇编（下）》，第 268 页，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 年 9 月。

⑩ 台湾“国家图书馆”特藏组编《“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子部（四）·释家（汇编）》卷首书影“嘉兴藏最后一年刻本选例”，是《寂光豁禅师语录》，清康熙二十四年刊本，撰稿人郭启传说：“此书施刻愿文记康熙二十四年（1685），可以说是馆藏本最后刻成者之一。”见《“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子部（四）·释家（汇编）》，台湾“国家图书馆”，2000 年 5 月。这是根据馆藏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凿然有据的，但在同一部《“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子部（四）·释家（汇编）》中，“续藏”09033.1762《牧牛图颂一卷》，卷前有《刊牧牛图颂序》，未署“时康熙戊子（四十七年，1708）佛诞日白山纳信稽首撰”；卷末有迦陵音禅师跋文一篇，跋后题有“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佛诞日戒台寺了汇重刊”等字。“又续藏”09033.1928《磬山牧亭朴夫拙禅师语录六卷》，卷首牧亭朴夫拙禅师画像后为《语录序》，后署“雍正十一年（1733）岁在癸丑阳月李焯敬题”。文中避清讳，弘字缺笔，丘改字作邱，疑此是乾隆间刻本，而非雍正间所刊。上面所录有关这二种经的文字，都是《“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子部（四）·释家（汇编）》中著录的，分见第 606 页许媛婷、梁文芳文，第 664-665 页张子文、梁文芳文，不知是基于什么考虑，给忽略了。

⑪ 杨玉良：《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 年第 3 期。

⑫ 李富华《关于〈嘉兴藏〉的研究》中说：“《嘉兴藏》是始刻于明万历年间，